

## 鲤城法院家事审判制度改革调研报告

■ 厦门大学法学院“家有儿女”课题组\*

**摘要:**在“亲和睦诚”家事纠纷处置理念的指导下,鲤城法院积极探索家事审判制度改革,推行了一系列创新举措,如增设家事调解员、心理疏导机制、家事调查制度、家事案件回访帮扶制度等,均已取得初步的成效。目前在家事审判中,存在家事纠纷举证难、儿童利益最大化保护原则落实不充分、社会配套制度不完善等问题。为防止改革流于形式的弊端,必须采取有力的应对措施,继续深化改革,推动家事纠纷的合理解决,发挥家事审判维系家庭和社会稳定的作用。

**关键词:**家事审判;家事调解;儿童利益最大化

### 引言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谐稳定是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民族繁荣的基石。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多元观念的融合,我国家事纠纷明显增多,并呈现出案件争议多元化、案件类型新型化、案件纠纷复杂化等特点,这对司法实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自开展家事审判改革以来,各试点法院不断创新家事审判工作机制,逐步完善家事审判工作规则,机构和队伍专业化建设进展迅速,物质保障更加有力。<sup>①</sup>家事审判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然存在不少的问题。“总体来看,家事审判改革缺乏统筹规划,各地法院遵从严肃诉讼法理进行深层次改革部署的尚不多见,改革中存在浅层性、非理性、盲目性和急功近利

---

\* 课题指导老师:齐树洁(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课题组成员:廖瑜婧、袁静宜、曾宇航、杨少卿(以上成员均为厦门大学法学院学生),林芙蓉(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学生)。在调研过程中,课题组得到了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sup>①</sup> 程新文:《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回顾与前瞻》,载《人民法院报》2017年10月11日第7版。

性。”<sup>①</sup>在此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意见》,要求加强与相关职能部门和单位的协调配合,推动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组建专业化家事审判机构或团体,以及探索配备专门从事家事调解、家事调查、心理辅导等工作的司法辅助人员等。

作为全国首批家事审判改革试点单位,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鲤城法院)遵照最高人民法院的改革要求,立足闽南乡土文化,努力探索具有泉州特色的家事审判改革路径。鲤城区位于泉州市中心城区,是海峡西岸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习惯于称之为“泉州”。该区东、北邻丰泽区,西、北毗南安市,西、南与晋江市交界,陆域面积53.74平方公里,总人口36万。<sup>②</sup>鲤城法院现有干部职工107人(其中员额法官37名),设有政治处、办公室、监察科、刑庭、民一庭、民二庭、行政庭等12个内设机构,浮桥、鲤中2个派出法庭,开发区、交通2个巡回法庭及法警大队。<sup>③</sup>2013年至2018年鲤城法院共受理各类家事案件1519件,审结1551件,其中离婚纠纷案件占79%。从总体上看,家事案件的数量逐年攀升,审理难度日趋增大。

## 一、家事审判制度改革的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受经济社会发展和思想观念多元化等因素的影响,家庭纠纷明显增多,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也日益增加。据民政部的大数据显示,我国的离婚率自1997年以来连续20年递增,从1997年的0.97%上升至2017年的3.15%。<sup>④</sup>随着离婚率的不断增长,大量家庭纠纷频发,如未成年人的抚养教育、妇女权益维护、老年人赡养等问题时有发生,家事纠纷数量的大幅度上升,对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和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相比,人民法院家事审判在审判理念、体制机制、司法能力、专业化程度等方面还不能完全适应。”<sup>⑤</sup>一方面,家事案件审理结果的质量高低关系到当事人及其家庭成员的切身利益。因此,家

① 王德新:《家事审判改革的理念革新与路径调适》,载《当代法学》2018年第1期。

② 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鲤城简介》,http://www.qzlc.gov.cn,下载日期:2019年4月26日。

③ 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法院机构建设》,http://www.qzlcfy.com,下载日期:2019年4月26日。

④ 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网,http://www.mca.gov.cn,下载日期:2019年4月26日。

⑤ 程新文:《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回顾与前瞻》,载《人民法院报》2017年10月11日第7版。

事审判中还需要考虑到案件中所包含的家庭伦理观念和血肉亲情因素,通过特殊程序解决纠纷,尽可能地维护家庭的和谐稳定。另一方面,在司法实践中很多法官认为家事案件技术含量低,纠纷往往只涉及家长里短,审判过程既不能体现专业水平又常常吃力不讨好,因此不愿意从事家事审判工作。这种错误心理导致“真正留守家事审判第一线的法官,往往是一些生活经验少、阅历浅的年轻法官或者审判专业水平相对较低的法官”<sup>①</sup>。家事案件具有特殊性,若由缺乏丰富社会阅历、人生经验和调解技巧的法官来处理,往往审理不够全面,这容易使得家事审判案结事未了,埋下隐患。

此外,我国传统的家事审判仍遵循辩论主义、处分原则等财产纠纷审判原则,没有强化法官的职权探究。<sup>②</sup>这种审判方式难以实现家事审判维护婚姻家庭稳定、保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目标。在英、美、日等国,为妥善解决家庭纠纷,已经建立了专门的家事审判法院以及配套的专业咨询和辅导机构,而我国却仍未区分家事审判和民商事审判,缺乏相关的制度设计。

为回应社会关切、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改善家事审判工作现状,促进社会健康和谐发展,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4月发布《关于开展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要求通过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转变家事审判理念,推进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创新,探索家事审判专业化发展。为此,经最高人民法院确定,108个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自2016年6月1日起,开展为期2年的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

## 二、鲤城法院家事审判的实践创新

2014年12月,鲤城法院成立了家事法庭,推出并执行了一套更具有操作性与可行性的工作制度。该机制运行五年以来,取得了良好成效。从2013—2018年鲤城法院家事法庭案件受理情况对比表中可以看出,家事案件的调撤率均在50%以上,2017年达到了67.42%。(详见表1、图1)。该院在积极探索家事审判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家昌”的目标。

<sup>①</sup> 陈爱武:《论家事审判机构之专门化——以家事法院(庭)为中心的比較分析》,载《法律科学》2012年第1期。

<sup>②</sup> 周侃、徐聪萍:《家事审判:创新司法理念 探索工作机制》,载《人民法院报》2016年6月1日第7版。

表 1 2013—2018 年鲤城法院家事法庭各类案件受理情况数

案件类型 (件)	离婚纠纷	继承纠纷	抚养纠纷	赡养纠纷
2013	220	14	12	0
2014	214	24	18	1
2015	215	24	18	1
2016	235	14	18	2
2017	180	30	16	4
2018	189	20	15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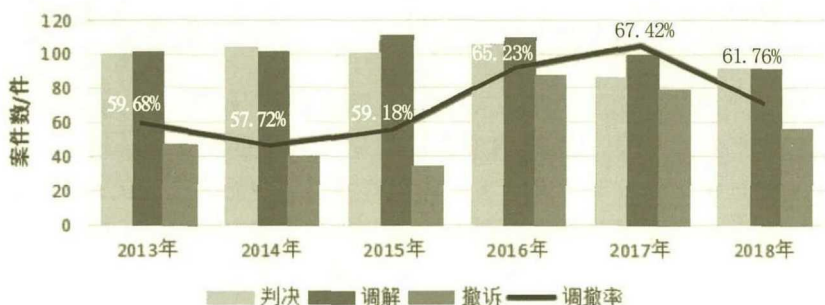


图 1 2013—2018 年鲤城法院家事法庭受理案件情况对比

### (一) 审判理念的转变

家庭的幸福和谐关系到每一个普通人的利益以及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家事案件自身特有的血缘、伦理关系使其与传统民商事案件差别较大。就单个家事案件而言,家事、法律、情理交织,所涉内容庞杂。2019年4月,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家事审判改革的现状,我们前往鲤城法院进行调研。课题组成员采访了几位家事审判庭的法官,探寻他们在审理家事案件中如何实现情、理、法的平衡。吴志婷庭长告诉我们:“家事案件很少大是大非,更多的是家长里短的小矛盾。很多时候法律适用其实不是很大的问题,难点在于如何维系亲情。因此我们在审理过程中主要采用家事审判柔性工作机制。”2018年3月27日,中央电视台《庭审现场》栏目报道的一起由鲤城法院审理的家事案件便生动地体现了该柔性审判机制。张某、吴某成夫妻向法院提起保管合同诉讼,要求二女儿吴某兰偿还老夫妻委托保管皮箱中的10万元,以及2014年5月至2017年6月代为领取的

工资,共计43万余元。该案从表面上看是保管合同纠纷,但实际上是一起家庭内部父母子女之间、姐妹之间矛盾引发的赡养纠纷。如果就案论案,简单驳回了事,不仅没有解决矛盾,可能还会衍生其他纠纷,甚至激化双方的矛盾。该案发生在父母与女儿之间,矛盾冲突较为激烈,化解难度较大。主审法官在审理过程中抓住问题症结所在,并步步推进,抽丝剥茧般解开疑惑,庭前庭后“法、理、情”相结合,用心劝解双方当事人,取得了较好的效果。<sup>①</sup>可见,在审理家事案件时,法官若只是死板地适用法律,就很难达到“情、理、法”相统一的效果,甚至还可能会使家庭矛盾升级,家庭功能紊乱,而这有悖于法律的初衷。

从鲤城法院家事审判庭的场景布置中也可以看出法院审判理念的转变。该院专门设立由家事法庭、家事调解室、少年法庭组成的家事审判功能区。家事调解室中暖红色的椅子、清新淡雅的黄色墙壁,供当事人聊天的茶桌沙发等,都意在营造出温馨的氛围,从而平复当事人在法庭上紧张对抗的情绪。家事法庭外的文化走廊则将泉州传统文化与家事审判相结合,介绍了蕴含“亲和睦诚”理念的孝感巷、连理巷、礼让巷和聚宝街四个老鲤城故事。家事审判案件往往还涉及儿童,如果他们看到自己父母在法庭上剑拔弩张、互不相让,势必会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不良的影响。因此,鲤城法院特地设立了供孩童阅读玩乐的亲子活动区。这些布置都反映出了家事法庭特有的温情的一面。法官助理温鸿告诉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很强烈的厌讼情绪。人们都认为家丑不可外扬,能让当事人走到法庭来的都是家庭内部比较严重的纠纷。他们来到法院时,情绪都比较激动。我们在设计家事审判庭时,就考虑到如何先用法庭温馨的外观感化当事人。”这些布置虽然都只是家事审判“形式上”的修饰,但是毕竟是当事人初进法庭的“第一观感”,在实践中,对当事人情绪的缓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 (二)增设家事调解员

构建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ADR)是适应家事纠纷的特殊性及跳出“家人间对簿公堂、法庭相争困境”的有效路径,家事调解则是家事纠纷ADR的核心方式。<sup>②</sup>家事调解在家事审判改革中至关重要,鲤城法院在改革中,结合当地实际和闽南特色文化,建立了融合家庭亲情的家事调解员制度。

家事纠纷产生的原因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多变性的特点,调解效果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事调解人员的调解技巧和方法。考虑到女性细腻温和的

<sup>①</sup> 黄嫩良:《泉州鲤城法院逐步推进家事纠纷专业化审批,巧解千千结》,http://fj.sina.com.cn,下载日期:2019年5月18日。

<sup>②</sup> 厦门大学法学院课题组:《福建法院创建“家事法庭”的探索与实践》,载齐树洁主编:《东南司法评论》(2016年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性格特点,鲤城法院的家事调解员大多为女性,此种做法更有利于双方当事人的矛盾化解。家事调解员主要来自居委会、妇联或司法行政机关的一线工作者,大多拥有丰富的社会阅历、专业技能和沟通协调能力<sup>①</sup>。他们在调解案件时可以结合自身实践经验,更全面地考虑到双方的合理合法权益,通过换位思考和专业素养提高调解的成功率。例如,鲤城法院在审理一起“再嫁难题”案时,通过引入家事调解员机制,成功地化解了纠纷。<sup>②</sup>除此之外,鲤城法院专门设立家事调解员工作室,调解室的家庭元素在调解之时便能使得双方当事人共同感受家庭文化和氛围,缓解双方冲突的心理。家事调解员的增设和家事调解室的设置,符合家事审判中“情法相融”的理念特色,最大化地体现人文关怀和司法温暖。

### (三)引入心理疏导机制

最高人民法院在《意见》中明确提出家事审判应引入心理疏导机制。该文件预示着心理学与司法流程的联系更加紧密,法律工作越来越“贴近人心”。根据家事纠纷案件的具体情况,法官和家事调查员可以建议当事人及遭受家庭创伤的人接受心理疏导,当事人及相关人员也可以主动申请心理疏导。家事案件的心理疏导机制通过心理咨询师的沟通,缓解案件中当事人因心理而产生的矛盾冲突。

鲤城法院家事审判庭成立以来,积极探索工作新模式,加强心理疏导在家事案件中的重要地位,开展心理疏导帮扶,发挥心理咨询师在调解工作中的作用。家事案件的陪审员由两名心理咨询师担任,介入纠纷调处过程中的心理干预和疏导,在立案时向当事人发放《心理疏导工作联系函》,建议当事人可以就家庭关系进行心理咨询,并引导他们前往有资质的心理咨询师处开展心理咨询。心理疏导有助于帮助家事纠纷当事人化解心结,消除芥蒂,重建亲情。2015年9月

① 例如,鲤城法院在2018年3月聘请了16名家事调解员、调查员,他们分别来自鲤城区妇联、司法局、街道、社区、学校等各部门单位,包括妇女干部、基层干部、心理咨询师等,任期三年。

② 例如,2015年,在鲤城法院受理的一起家事案件中,吴某和陈某2001年结婚,2008年陈某因患脑瘤长期卧病在床,由吴某独自照顾长达6年之久。吴某的同事黄某被她的善良所感动,要求和吴某结婚,共同照顾陈某,但吴某遭遇“再嫁难题”。吴某向鲤城法院提起了与陈某的离婚诉讼,但因陈某的父亲原本就不同意其儿子与吴某的婚事,现吴某又提出离婚,双方矛盾加剧。陈父拒绝做陈某的代理人。鲤城法院杨佩芳法官受理案件后,立即到陈某的家中实地走访,建议吴某向法院申请宣告陈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此后,杨法官联系家事纠纷服务站,邀请家事调解员、街道司法所、社区工作人员到双方家中多次进行调解。最终不但陈某家人同意离婚,而且还妥善解决了陈某住房、生活费、医疗费等问题,并促成了吴某与陈某家人尽释前嫌。不仅如此,在杨法官的帮助下,陈某家庭还获得了1万元救助金。

至今,家事陪审员已为61名家事纠纷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婚姻辅导。

#### (四)设立家事调查制度

家事纠纷有别于普通民事纠纷,融合了情与法的因素,具有婚姻家庭的伦理性、身份关系的特殊性、情感纠纷的私密性、矛盾冲突的复杂性等多种特征,在发生纠纷时往往难以举证。此外,以身份关系为羁绊的家事纠纷与社会公益有密切关系,如果家事纠纷认定的事实有偏差,不但会损害案外人的合法权益,也有可能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聘用专门的调查人员深入了解案件事实便显得十分重要。鲤城法院专门建立了家事调查机制,由家事调解员兼任调查员,到当事人家中深入了解情况。调查员在走访过程中就当事人的身心状况、家庭关系、经济状况、居住环境、个人经历、教育程度等案件事实进行实际调查,并向法官反映调查结果,使法官在判定案件事实时做到“心中有数”。这些调解员、调查员大多来自司法局、关工委、学校、妇联、社区等组织机构,与当事人接触较多,更能够通过沟通谈话深入矛盾,了解问题核心。上文提及的“皮箱案”中便运用了家事调查制度。看似简单的保管合同问题背后,实则隐藏着复杂的赡养问题。王文鑫法官启用了家事调查制度,通过家事调查员的协助,最终化解了老人和女儿之间的矛盾。正所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家事调查制度能使法官更加了解事实情况,从而解决举证难、认定难、利益平衡难的问题,做到及时有效地化解家事纠纷,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社会和谐稳定。鲤城法院设立家事调查制度正符合了“调解先行,弥合亲情”的改革理念。

#### (五)建立家事案件回访帮扶制度

为了提高家事案件的审判质量,达到真正解决矛盾、巩固调审成效,鲤城法院还设立了家事案件回访帮扶制度。“家事案件回访帮扶”是指根据家事案件的具体情况和需要,由家事法官、家事调查员、家事调解员等相关人员对已审结的家事案件的后续情况进行跟踪了解并提供帮助。在实践中,法院根据审理状况和需要,对以下几类案件开展相应的跟踪回访工作:(1)撤诉、调解和好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2)同居关系子女抚养权、抚养费纠纷,变更抚养关系纠纷,探望权纠纷,抚养费纠纷以及自愿调解离婚和判决离婚的案件;(3)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4)赡养义务人人数多、分歧大、矛盾深的赡养案件等。这些案件涉及家庭关系的修复以及弱势群体的利益保护,需要法院回访,以调查是否做到了案结、人和、事息。通过回访,法官能够及时了解当事人在案件处理后的思想动态以及目前家庭的真实情况,帮助当事人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从而更好地总结经验,提高家事审判的质量。鲤城法院的吴志婷庭长曾经审理过一个赡养案件在调解结案后,吴庭长考虑到案件的特殊性,对老人进行了回访。在回访中吴庭长了解

到了老人病重住院的情况,立即热心地向鲤城区政法委申请了救助金,使处在困境中的家庭重获希望。家事案件回访帮扶制度是对家事审判服务的延伸,增强了家事审判的社会服务功能,是家事审判改革的重要一环。

### 三、家事审判制度改革的隐忧

最高人民法院开展家事审判工作试点三年以来,各地法院创新举措频出,例如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法院江宁女子法庭、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法院的“红旗模式”、重庆梁平法院“1127”改革思路等,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各地法院在自行探索期间,也存在着浅层次、不全面等一系列问题。

#### (一)家事纠纷举证难

家事案件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其证明存在着许多问题,如证据收集难、举证难等。这在审判实践中造成了诸多弊害:首先,证据的缺少和举证的困难使得案件事由不清,可能误导法官对实情的认定。其次,由于证据的模糊,而法官在家事案件中的自由裁量权较大,其主观色彩、社会阅历差异都可能会导致同案不同判的结果。最后,举证难阻碍了当事人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影响了公平和效率价值的实现。

在调查中,课题组了解到家事纠纷中举证难的情况时有发生。例如,在鲤城法院审理的一起离婚案件中,当事人对于一方是否违反夫妻忠实义务发生争议,无法提供相关的证据。这主要是因为,此类行为具有较强的隐秘性,大多数当事人难以采集直接证据。另外,鲤城法院在审理涉及老人孩子的家事案件时,当事人受到自身生理因素和弱势地位的影响,往往无法提供有效证据。举证难的问题加大了被害人败诉的风险,而且会使法官对案件的审理产生误导性判断,降低了法院办案的质量。部分当事人因此产生错误理解,对诉讼产生抵触情绪,法院形象进而受损。

#### (二)儿童利益保护最大化原则落实不充分

如何保护儿童利益是法治社会建设中应该考虑的重要问题。儿童权利保护的“最大利益原则”早在1989年联合国制定的《儿童权利公约》中就得到全世界的普遍认可。该公约第3条第1款规定:“关于儿童的一切行为,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在我国的家事审判实践中,有些父母只顾着争夺自己的利益,甚至将孩子的直接抚养权当作谈判的筹码,使得儿童处于极度不利的地位。一些审判人员为了日后执行更加顺利,会将抚养权的归属问题简单交由当事人协商。由于我国并未设立离婚案件未成年子女的“特别代理人”制度,没



有专门代表他们利益的人参与协商或参加诉讼,子女的利益通常只能听由法官和父母的意志支配。

课题组在调研过程中旁听了一场离婚诉讼的开庭审理,其争点之一在于两个孩子的抚养权。双方当场达成对孩子抚养权的调解。然而,当事人的子女并没有参与协商过程,没有表达自己意愿的途径。虽然法官在调解过程中会询问孩子的意见,但是这种询问更多是起到一种安抚的作用。此外,在涉及多名子女抚养问题时,法官常常会将多名子女拆分,而较少考虑分开抚养是否会对儿童健康成长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家事审判应走出“父母本位”的传统窠臼,树立“子女本位”的新型审判理念与制度。

### (三)社会配套机制不完善

家事纠纷虽然发生在家庭内特定人之间,但是其影响可能扩及整个家族,因此,调解家事纠纷是首选。而“无论是为了恢复家庭原有秩序还是重新建立更合适的未来新秩序,都需要有一定的外部力量协助”<sup>①</sup>。如亲属法专家、心理学、行为学专家参与辅导和调解,妇女组织成员担任陪审员参加审判等等。一个家事纠纷也可能同时需要贫困救助、心理救助、社会救助等多方面力量的化解。然而在鲤城法院的司法实践中可以发现,社会力量主动介入的情况较少。在案件解决过程中若需要外部力量的协助,一般是法官个人主动联系相关组织,如妇联、社区、司法局等。由于缺乏专门化的机构或者完善的联动机制,案件的解决质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法官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全某和何某离婚案件为例,案件解决的关键是法官联系相关单位,协调有关部门,最终帮助何某的女儿在当地小学就读,<sup>②</sup>而不是相关的组织机构主动介入解决。家事案件中有许多问题单靠司法或其延伸是无法解决的,比如离婚后患精神病或者身体残疾的一方的照顾问题、孩子的教育问题、服刑人员刑满的再就业问题等等,都需要社会建立相关的支撑体系。

上述情况体现了在家事审判改革中存在着流于形式、实践效果有限的问题。其一,在进行心理疏导的过程中,当事人常抱有抵触情绪,不愿表达内心的真实

---

① 陈爱武:《论家事审判机构之专门化——以家事法院(庭)为中心的比较分析》,载《法律科学》2012年第1期。

② 全某是湖北省宜都市人,在晋江某服装厂工作,妻子何某系四川省华蓥市人,在泉州市清濛开发区经营服装店,两人生育一女,现因夫妻分居多年,感情破裂,女方起诉要求离婚。最终,经调解,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全某与何某离婚,婚生女由何某抚养,全某每月支付抚养费1000元给何某。全某和何某对调解协议都不持异议,但何某担心女儿是外地户口,很难在本地入学,离婚后若将其送回老家读书会给女儿造成更大的伤害。为此,杨佩芳法官联系相关单位,协调有关部门,最终帮助何某的女儿在当地小学就读。

想法,疏导人员无法了解实情,效果自然也就不尽如人意。其二,法院缺乏专业的心理疏导人员,人员配备不完善,而外聘专业心理医生的成本费用又过于高昂。因此,心理疏导机制并未实际发挥作用,没能达到改革的预期效果。其三,在家事调查中,家事调查员来自社会各个行业,并非专业的司法人员而是由家事调解员兼任,缺乏专业能力和足够的时间精力。家事调查员的作用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在实践中运用得较少。此外,家事调查制度还存在着定位不明晰、证据转化机制空白、调查内容局限等问题,导致家事调查制度的作用没有完全得到发挥。

## 四、完善家事审判制度的对策

针对鲤城法院在深入推进家事审判制度改革中的困境,课题组尝试结合法院的实际情况寻找出路,使得法院既能回应群众的司法需求,又能提高自身效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改革的目标。

### (一)减轻举证责任

家事审判制度设立的初衷在于改变审判理念和审判方式,倡导有温度的家事纠纷化解机制。如今举证难这一问题严重阻碍了家事审判制度改革的进程,各试点法院应当采取积极的救济措施,使得双方的诉讼地位趋于平等。

首先,加大普法力度,切实提高公民的法律知识水平。除了普及一些法律常识外,法院还可以结合自身业务特点,开展一些通俗易懂的普法活动,如坚决贯彻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则,凡是应当公开开庭审理的案件一律公开审理,让更多的人走进法庭旁听。一方面,可以以案释法,教育群众,达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目的;另一方面,还可以让群众了解基本的诉讼常识,提高应诉能力。

其次,明确证明标准,减轻当事人的证明义务。如今学界对于证明标准和证明责任仍然有着不同的争议,证明标准是指法律要求的诉讼证明中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一般而言,证明标准越高,当事人所负担的证明义务越大,反之则越轻。在当事人陷入举证困境时,适当降低当事人的证明标准不失为一种良好的解决途径。但在不同的案件中,应当明确不同的证明标准,否则在实践中无限降低证明标准将会造成双方当事人诉讼地位的失衡。同时,对于证明标准进行细化,当事人的证明标准越明确,法官的审理标准也就更加清晰,相较于一般的证明标准分层,也能更好地规范法官的自由心证。

最后,完善家事调查员制度,使案件事实更加清晰。家事调查员制度在域外早有实践:英国1991年《家事诉讼程序规则》专门规定了家事调查官的职责。英国家事调查官在离婚诉讼中进行调查并在庭审中作出报告,接受各方当事人就

报告中的任何事项所进行的提问。<sup>①</sup>事实上,家事调查员能够以更加直接的方式感知当事人的情感,全面了解当事人的婚姻家庭状况,他们对家事纠纷事实的探知更为清晰、准确、全面。完善家事调查官制度,使得家事案件中的证据收集由专业人员进行,直接减轻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和举证难度。另外,将家事调查活动同法院审查判断案件事实隔离开来,有利于消除当事人对法官公正处理家事案件的疑虑,提高家事纠纷解决的司法公信力。

## (二) 树立“子女本位”的司法意识

自20世纪以来,国际组织和联合国已开始倡导应当尊重和优先保护儿童的理念。《儿童权利公约》确立的行使原则是指导监护制度建立的标准,也是指导社会介入监护的行为原则。然而,原则性的规定常常由于过于“空泛”而缺少执行力,因此我国必须建立相应的制度来细化该原则。

从调研情况来看,鲤城法院以“大调解”的方式弥补了儿童利益保护不足的问题。与传统的调解方式不同,该院构建的“大调解”工作平台加强了与妇联、基层社区街道等的联络。妇联、街道邻居对当事人的情况较为了解,听取他们的意见,能让法官更全面地考虑子女抚养权的归属。共同抚养也是鲤城法院调解的常用措施。法官助理温鸿表示:“如今很多‘80后’‘90后’的夫妻,他们本身自己就是独生子女,而他们的孩子在二胎开放之前大多也是独生子女。因此,双方都不想失去子女的直接抚养权。在双方争夺抚养权的情况时,我们会尽量劝说双方共同抚养,比如说,周一到周五谁家离学校比较近就去接送,周末再到另一方家里生活。”这种做法很大程度上减轻了父母离异对孩子所造成的不利影响。

未来的家事立法应注重区分未成年子女的利益与父母的权利,明确未成年子女的主体地位。法院在处理离婚案件子女的抚养权、监护权时,应以子女利益为本位,不必再有过多例外的考量。这也是我国民法典亲属编中亲子法应当坚持的立法理念。

## (三) 积极构建新型家事纠纷综合协调解决机制

家事纠纷调解需要最大限度地动员和发挥社会力量,但我国在这方面的实践较少,因此我们建议,可以参考其他国家的相关先进经验。

英国法院在处理家事纠纷时,与社会支持系统配合,成立儿童及家事法院咨询服务机构(Cafcass),参与或组织家事纠纷调解和调查。法院处理分居、离婚和安排孩子居所及生活照顾时,通常会有社工人员、诉讼监护人、法院福利官、法院指定的诉讼代理人、教师、警察、家庭医生、心理学家、精神病医师、小儿科医生

<sup>①</sup> 黄丹翔:《英国家事诉讼程序简介》,载《人民法院报》2013年9月13日第8版。

等主动介入并提供意见。<sup>①</sup> 美国家事法庭适用抚养协调机制:在解决离婚纠纷时,专家对当事人进行与子女需求相关的教育,来制订并协助当事人执行子女抚养计划。<sup>②</sup> 澳大利亚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家事服务网络,包括家庭辅助处(Family Assistance Office)、儿童支持署(Child Support Agency)、社区法律中心、家庭暴力危机专线、“家庭关系中心”、法律援助委员会(Legal Aid Commissions)、澳大利亚关系协会(Relationships Australia)、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协会等,更加注重非诉多元化解决途径。

这些域外经验都有着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充分发挥各个社会部门的作用。我国也在这方面开始行动。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建立由15个部门参与的“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联席会议制度”,该制度为全国各级法院起到重要的表率 and 示范作用。<sup>③</sup> 在具体的协同联动中,各地法院积极与当地综治办、民政、公安、妇联、社区服务等部门创建形式多样的合作方式。例如,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依托“一庭三所一处”(即人民法庭、辖区派出所、司法所、法律服务所、公证处),构建家事案件多元化纠纷化解平台。海南省屯昌县人民法院与县司法局、民政局(老龄办)、村委会、人民调解组织建立老年人维权联动机制,探索赡养协议司法确认制度。<sup>④</sup>

因此在现有体制的框架下,试点法院要继续深化《意见》:“推动建立司法力量、行政力量和社会力量相结合的新型家事纠纷综合协调解决机制,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相关法院可以依托社区、司法所、妇联等其他调解力量,成立家事调解所、家事调解委员会等,协助法官做好案件的调解和调查工作。同时,在家事法庭中引入心理治疗、社会观护、社工关怀等,由社会力量协助纠纷调处,从而形成有效的社会合力,切实妥善化解家事纠纷。

家事审判制度改革流于形式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配套制度不够健全,即虽然建立了新制度,但是支持新制度运行的配套措施和人员还未同步更新。例如鲤城法院虽然建立了心理疏导机制,但是心理疏导人员的筛选、聘请、专职化等相关措施均尚未明确,在实务中,心理疏导人员主要还是外聘的心理医生,而非法院所配备的专职心理咨询人员。因此,能否解决改革措施流于形式的问题关键在于相关的配套措施配合改革是否同步进行。我国法院应借鉴域外家事审

① 陈爱武:《家事法院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7页。

② 杨小利:《美国家事法庭解决抚养纠纷的新机制》,载《中国应用法学》2017年第5期。

③ 李阳:《为社会建设奠基,为幸福生活护航》,载《人民法院报》2018年7月20日第1版。

④ 王宇:《家事改革试点收获诸多创新做法》,http://www.legaldaily.com.cn,下载日期:2018年5月25日。

判的做法,“在关注法律适用的同时,也注重在医学、生物学及社会学等的综合运用分析,团队设置全面饱满”<sup>①</sup>,做到家事人员专业化、职业化,提高家事审判改革制度的可操作性。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为避免改革措施流于形式,需要在实践中积累经验,不断完善相关制度。鲤城法院根据闽南当地特色探索建立的家事审判新模式,便是来自实践的经验总结。当然,改革绝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过程,仍需要不断试错与调整。鲤城法院将继续关注上述措施的实际效果,在原有的基础上争取结果高效化,使家事改革真正落到实处。

---

<sup>①</sup> 徐萌萌:《域外家事诉讼机构之比较》,载《法制博览》2018 年第 27 期。